

谈笔室义新树



黄永年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兼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主要著作有《唐史史料学》

《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

《古籍版本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新义室笔谈 / 黄永年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9

(当代学人笔记丛书)

ISBN 7-80622-322-3

I. 树... II. 黄... III. 中国 - 历史 - 史料 - 研究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0900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技术编辑 张绍军

封面装帧 姜明

树新义室笔谈

黄永年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邮编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3 千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22-322-3/I · 100

定价: 25.00 元

自序

我不是什么作家,从未写过随笔、笔谈之类的文章,现在出版社要我写一本,岂不像我家乡的谚语:“捉老鸦在树上做窠。”好在说是要学术性的,而学术性文章在半个世纪前我就曾发表过,到目前好歹也积存了上百篇,尽管多是以论文形式出现。如今挑选一些稍事改写,舍弃不甚必要的繁征博引,压成每篇三千字左右,不也可以充数缴卷吗!何况现在纯学术性的论文集读者少,好些出版社不愿出,现在改用笔谈的方式,在争取读者上也许会有利一些。

我国传统的诗文集有两种编排法,一是按内容,一是编年。前些日子拜读的王元化先生的《思辨随笔》,则是按内容编排而在文后注出写作年份。我认为这种体式比较好,可以照办。不过我所注的年份不是写作年份而是所据论文原本的发表年份。

从所注的年份可以看到,我最初写作是在解放前上大学期间。以后统一分配做了几年思想政治工作。1957年错划后才重理旧业,先后写了有关唐代财经和碑刻书法的文章,当然要到“文革”以后才和当年的大学毕业论文陆续发表。80年代到90年代初主要从事唐史的研究,还旁及古典小说。90年代中后期又转到北齐、北周和杨隋史事的探讨上。写作方式则依旧用论文,除了出版过几本讲义外没有敢写专著。因为专著必须对某个时期或某个领域作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后方可动笔,我至今愧无此才能。

写到这里,对这本书的书名《树新义室笔谈》倒似需要作点解说。说实在,我是不擅长给书斋起名称的。上大学时用过“茭蒲青果室”,是因为其时家居常州青果巷,后门又是茭蒲巷的缘故。“文革”中借用陆放翁的“心太平庵”,并请钱公君匋刻过方小印,则是外界虽乱我心尚平静的意思。凡此均已事过境迁。这次本想直率点就叫《黄永年学术笔谈》之类,但出版社不同意,思索再三,就叫“树新义室”如何?这所谓“树新义”者,还是抗战胜利之初从陈寅恪先生给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写的序里看来的。序里说抗战时陈垣留北京辅仁大学讲学,寅恪先生南迁执教于西南联大,“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即俱保持民族气节之谓。我这里只是借用了这个本属中性的“树新义”,用来说拙文都有些新东西,或本为人家未曾讲到,或人家讲得不对,我来加以纠正。我认为这二者是写学术文章的起码要求。否则重复人家讲过的东西,把人家的东西冒充自己的创见,那就形同盗窃。早在《礼记》的《曲礼》里就有“毋剿说,毋雷同”的训诫,何况讲精神文明的今天。

不过讲人家未讲过的还容易,人家讲得不对想要纠正,却常会遇到阻力。而我这些文章中偏偏有近半数是和人家立异同,要给一些大名家作诤臣的。如这本拙著一开头就不同意缪彦威(钺)先生提出的北齐政治斗争是胡汉之争,尽管彦威先生生前是我尊重的前辈。在讲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时,也不同意先师吕诚之(思勉)先生的推测而要另立新说。其中对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提出异议处就更多一些,因为我要探讨隋唐以至齐周的历史,正好闯入了寅恪先生当年的研究领域。如手头保存的大学时所写旧文中,《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便是对寅恪先生作驳难的,当年将剪报寄先生后,先生不以为忤,很礼貌地由夫人代笔作复,并回赠新撰《长恨歌笺证》的抽印本,这种事情当时人们都认为很正常。但近若干年来可有点不正常了。先是在80年代初,就有位比我年长的教授警告我,叫我不要再写和寅恪先生立异同

的文章。近来还听到一些嘀嘀咕咕的议论,好像寅恪先生成了谁都不准触犯の绝对权威,对寅恪先生也得讲两个“凡是”似的。其实这些教授先生们认为我说得不对,尽可写文章来批驳,何必玩这种文章以外的小动作呢?至于我,自然不会因此而敛手搁笔,所以在这本拙著里仍把我和寅恪先生的异同之处一一写进去,让读者来评判是非曲直。

学术性笔谈编了七卷,最后第八卷是对几位老师的回忆文字,一仍发表的原貌不再改作。



目 录

卷一 齐周旧事

高欢父子用文士抑勋旧	1
高演政变非鲜卑抑汉	4
高纬时文武之争	10
北齐文化远胜北周	14
关于《北史·恩幸传》	17
宇文泰建立八柱国制初非囿于鲜卑旧俗	21
增设六柱国以扩军整训	24
府兵制败坏原因	29
隋末唐初“关陇集团”已不复存在	34

卷二 李唐遗闻(上)

袭杀建成元吉何以要在玄武门	39
常何之升沉荣辱	44
武曌出生地与《利州江潭作》	47
李武政权	50
张柬之等政变之再认识	53
所谓韦后乱政	60
李隆基夺取政权	64

徐敬业平反问题	68
武曌之行宽典	72
从刘潜墓志看唐代职官	74

卷三 李唐遗闻(中)

马嵬驿杨妃之死真相	76
宦官高力士与禁军	80
论安禄山叛乱之“二统”说	83
抗击安禄山战略剖析	88
朔方军与朝廷	91
李晟非贤将	97
二王八司马及其对立面之士庶问题	102
所谓永贞革新	108
顺宗政治集团之形成与覆灭	114
何来永新元年	117

卷四 李唐遗闻(下)

和籾以济京师初不始于盛唐	120
用原始文献考说两税法	124
两税法并未减轻剥削	129
书籍不造而得其虚实	132
饼在唐长安城	134
面衣	138
佛教何以能战胜道教	143
狄仁杰奏毁淫祠	148
狐臭与胡臭	155

卷五 文苑辨疑

土伯九约	160
------------	-----

《七步诗》·····	162
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	168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	172
《长恨歌》非纪实·····	178
《长恨歌》评价·····	184
《辛公平上仙》·····	189
《三梦记》辨伪·····	192
《东阳夜怪录》王注匡正·····	196
韦庄何以要讳《秦妇吟》·····	202

卷六 小说琐话

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	207
《济颠语录》·····	215
金盈之《醉翁谈录》·····	219
说朴刀·····	222
《西游记》简本出于繁本·····	228
百回本《西游记》最早刻于嘉靖初年·····	234
关于《二郎搜山图》·····	240
眉山七圣与哪吒太子形象之演化·····	243
《西洋记》之金碧峰·····	248
《天妃娘娘传》·····	255

卷七 艺海拾贝

威夷与委虬·····	259
“魃头”纠谬·····	262
十二时神·····	265
漆背金花镜·····	268
字体·····	270



王羲之书师法钟张·····	273
南北书派异同·····	275
吴故衡阳太守葛府君碑额·····	279
晋唐小楷不可信·····	281

卷八 师门追忆

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	285
记童书业先生·····	297
记陈子展先生·····	313
回忆吕贞白先生·····	318

卷一 齐周旧事

高欢父子用文士抑勋旧

北朝的历史，在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就很少有人研究。西魏、北周还有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问题。东魏、北齐有影响的文章就只有缪彦威（钺）先生的《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缪先生此文发表在1949年出版的四川大学《史学论丛》第一期上，后又收入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先生的《读史存稿》。文中论证其时统治层中发生过的三次重大冲突，均是汉人与鲜卑之间的政治斗争。这个说法颇为撰写教科书者所认同，但一经推敲便知实不能成立。

这里先说缪先生提出的第一次冲突，说是东魏孝静帝时汉人崔暹、崔季舒在执政的高澄支持之下纠劾鲜卑亲贵，到高洋执政在鲜卑亲贵的压力下又流徙二崔于北边。

这是否真系汉人与鲜卑的冲突，不妨重读一下记载此冲突的原始史料。首先是《北史》卷六《齐世宗文襄帝纪》也就是高欢长子高澄的本纪里所说^①：

^①《北齐书》传本已多残缺，而由后人用《北史》或《高氏小史》等抄补。凡遇此情况时我就径引《北史》。



自正光已后，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洁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于是风俗更始，私枉路绝。

这里只说“纠劾权豪”而没有提“鲜卑”。再是高澄执政前期其父高欢还健在，还留居晋阳遥控邺城的中央政权。他也采取和高澄同样的政策，这在《北齐书》卷三〇《崔暹传》里说得很清楚：

武定初迁御史中尉，……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及尚书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献，又弹太师咸阳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罪状极笔，并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高祖（神武帝高欢）书与邺下诸贵曰“崔暹……始居宪台，乃尔纠劾，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师，群官迎于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劳之曰：“往前朝廷，岂无法官，而天下贪婪，莫肯纠劾。中尉尽心为国，不避豪强，遂使远迹肃清，群公奉法。冲锋陷阵，大有其人，当官正色，今始见之。”

这里除纠劾豪强外仍旧看不出任何民族的意味。记载崔季舒惩治勋贵的《北史》卷三九《崔季舒传》同样无此意味。

再看他们惩治的权豪勋贵，除《崔暹传》开列的司马子如等人外，还有高欢的姊夫尉景，和司马子如同号“四贵”的孙腾、高岳、高隆之。试检这些人在《北齐书》、《北史》里的传，尉景当是西方尉迟氏人居北边而鲜卑化了的，孙腾是汉人鲜卑化了的，高岳是高欢的从父弟，而高欢常以鲜卑自居，尽管也许只是汉人或高丽人而鲜卑化了的，元坦以及元羨都是元魏的宗室，可朱浑道元、慕容献应都是鲜卑慕容氏的后裔，以上都多少可以排在鲜卑一边。但司马子如和高隆之却明明是汉人，而且从子如的“事姊有礼，抚诸兄子慈笃，当时名士，并加钦爱，世以此称之”，和高隆之的“钦尚文雅，缙绅名流，必存礼接，寡姊为尼，事之如母，训督诸子，必先文义，世甚

以此称之“等来看，在这二贵身上仍未失汉族文人的风度，可也偏偏成了被惩治的对象。而另有个对尉景射利纳贿极端厌恶，在高欢坐上要求作御史中尉来“捉尉景”的庾狄干，却又是家于善无的鲜卑人，见《北史》卷五四《尉传》、《庾狄干传》。还有上述鲜卑化了的孙腾，因为“亲狎小人，专为聚敛”，也会弄得包括鲜卑、汉人在内的“朝野深非笑之”，见《北齐书》卷一八《孙腾传》。这些都告诉人们此种斗争确实未曾以民族来划分营垒，不能说成是汉人与鲜卑的冲突。

高澄遇刺身死，高欢次子高洋继起掌权，第二年即取代东魏成为北齐朝第一个正式皇帝显祖文宣帝，崔暹、崔季舒此时确曾一度遭到打击，“各鞭二百徙北边”。而带头发动此次打击者偏又是这司马子如和高隆之两汉人，详见《北齐书》卷一八《高隆之传》、《司马子如传》及二崔传。但不久高洋知二崔无罪又召回重用，而高隆之转为高洋筑辱致死，司马子如亦被免官。怎么能抹杀这后面的事实光说高洋在鲜卑亲贵的压力下流徙二崔？何况要打击二崔的司马子如、高隆之虽可算亲贵却并非鲜卑。

其实高洋之任用汉族文人，尚早在他接班掌权之前，如高德政、杨愔、杜弼均是汉人士族而受信用，见《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卷三〇《高德政传》及《北史》卷四一《杨愔传》。当然也不宜以此来论证高洋之亲汉，其亲信之所以多汉人者，只是由于汉人士族多以文学政事见长，非勋贵所能企及而已。

附带说一下，这高德政和杜弼后来都为高洋所杀害，其根本原因当如《北齐书》卷四《显祖文宣帝纪》所说：

帝……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连耽湎，肆行淫暴，……沉酗既久，弥以狂惑，至于末年，每言见诸鬼物，亦云闻异音声，情有蒂芥，必在诛戮，……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蕢之等皆以非罪加害。



这显然是精神失常之所致，不能看到杀了高德政，杜弼等汉人，并杀了系出汉人的勋贵高隆之，就认为高洋到后期又对汉人存心摧残。何况《文宣帝纪》下文还说高洋“尝在晋阳以稍戏刺都督尉子耀，应手即殒；又在三台大光殿上以钺钺都督穆嵩，遂至于死”。这穆是鲜卑丘穆陵氏所改；尉如前所说是尉迟氏而鲜卑化者，说其时被冤杀者并不止是汉人。更何况其时杨愔等仍在纲纪政事，如《杨愔传》所说“自天保五年已后。一人丧德，维持匡救，实有赖焉”。这天保五年正是高洋掌权之后六七年，一人丧德即指高洋之因精神病而淫暴。而且《高德政传》、《杜弼传》还都讲到高洋杀高、杜后追悔，更可说明这只是精神病发作时的行为而非清醒时所决策，否则又追悔干什么。

末了我还想提醒一点，即如果东魏、北齐时鲜卑和汉人的冲突真十分剧烈，那到见灭于北周以至北周为隋所代后总多少该有点余波，怎么这种所谓鲜卑和汉人的冲突一下子销声匿迹，再也不见于《周书》、《隋书》了呢？可见就在东魏、北齐时候，这种民族间的冲突已不甚明显至少在政局上没有能表现出来，从前面的论证已可充分得到证实。

(1997年)

高演政变非鲜卑抑汉

彦威先生认为第二次冲突在北齐废帝高殷之时，说高洋在位时杨愔实为汉人士大夫之领袖，故主张立汉族高门赵郡李氏女为高洋皇后，高洋去世李氏所生皇太子高殷即位，杨愔等受遗诏辅政，欲使政权归己为皇太后之李氏而排斥鲜卑亲贵，遂有乾明元年二月之政变，高洋同母弟高演、高湛，在高欢后此时已为太皇太后的娄氏支持之下，袭杀杨愔等人，高演继而废高殷自立，汉人失败而鲜卑胜利。

这么说的主要依据是《北史》卷四一《杨愔传》。但传里的这些话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文宣(高洋)大渐,以常山(高演)、长广(高湛)二王位地亲逼,深以后事为念。愔与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侍中燕子献、黄门侍郎郑子默受遗诏辅政,并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可朱浑天和又每云:“若不诛二王,少主无自安之理。”宋钦道面奏帝(高洋子高殷),称二叔(高演、高湛)威权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许曰:“可与令公(杨愔)共详其事。”愔等议出二王为刺史,……又议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长广王为大司马、并州刺史,常山王为太师、录尚书事。及二王拜职,于尚书省大会百僚,……长广旦伏家僮数十人于录尚书后室,仍与席上勋贵数人相知,并与诸勋胄约,行酒至愔等,……尔辈即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诸王反逆,欲杀忠良邪!尊天子,削诸侯,赤心奉国,未应及此。”

只要不存成见,不事先构造框架,就会很清楚地看出这只是一场最高统治层中的权力之争。斗争之一方以高洋的皇太子、此时已即帝位的高殷为核心,以重臣杨愔等为骨干力量的正统合法的政治集团,另一方是其时的常山王即后来的肃宗孝昭帝高演和其时的长广王即后来的世祖武成帝高湛。

先说杨愔这一方。除了平秦王高归彦事先叛变投向高演、高湛外,和他一起被杀害的高殷集团人物还有燕子献、可朱浑天和、宋钦道和字曰子默的郑颐。这四人都有传附在《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后面。杨愔和燕子献、可朱浑天和都尚公主是高欢的女婿,宋钦道、郑颐早就高洋、高殷的亲信。尽管其中杨愔和燕、宋、郑都是汉人,却绝任何站在汉人立场的言行。至于可朱浑天和则并非汉人而是鲜卑,说他和参加汉人集团来反鲜卑,岂不更远于情理!



再看高演、高湛一方。他们之所以发动政变，也并非出于鲜卑的民族利益来反汉人，而只是自身感受到了威胁。据《北史》卷五一《神武诸子传》，高欢有十五子，其中皇后娄氏亲生的有六子，依次为文襄帝高澄、文宣帝高洋、高演、高湊、高湛、高济。高湊当时已去世，高济“尝从文宣巡幸，在路忽忆太后、遂逃归，帝怒临以白刃，因此惊怖”，也不会见忌，见忌的就只有高演和高湛。何况高洋对待诸弟本来就很严酷，非娄后所生的高浚和高涣就都因“有雄略”而为高洋囚杀，即高演据《北史》卷七《齐孝昭纪》也曾被“刀环乱筑，因此致困”。再加上高洋临终时有“常山、长广二王位地亲逼，深以后事为念”之说，而杨愔等也对他俩开始采取措施，他俩自然要发动政变以求一逞。至于由高演来取代高殷，则又是政变成功后顺理成章的事情。

政变中站在高演、高湛一方的还确其时的太皇太后娄氏。这在《北史》卷一四《齐武明皇后娄氏传》里说得最清楚：

天保初，尊为皇太后，……济南（高殷，殷被废后为济南王）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尚书令杨愔等受遗诏辅政，疏忌诸王，太皇太后密与孝昭（高演）及诸大将定策诛之，下令废立。孝昭即位，复为皇太后。孝昭崩，太后又下诏立武成帝（高湛）。〔武成〕大宁二年……崩于北宫。

这娄氏为什么要支持高演、高湛来反高殷呢？如说高演、高湛是她的亲儿子，那高殷也是她的亲孙儿。因而很容易让人们从民族问题上来考虑。因为此娄氏是鲜卑人，是《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匹娄氏后改为娄氏”的娄氏，那高殷生母、高洋皇后、此时为皇太后的李氏则是“赵郡李希宗女”，是汉人中的士族高门。《新唐书》卷一九柳芳所说山东地区“为大”的郡姓。而且《北史》卷一四《齐文宣皇后李氏传》还有这样的记载：

初为太原公夫人（高洋原封太原郡开国公），及帝将建中

官，高隆之、高德正（政）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杨愔固请依汉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犹固请废后而立段昭仪，欲以结勋贵之援，帝竟不从而立后焉。

但看同卷的其他皇后，文襄帝高澄后和孝昭帝高演后都是元氏，是出于北魏皇室的鲜卑人但已汉化，武成帝高湛后胡氏却是“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阳卢道约女”，则是汉人且当出于士族。再看《北史·神武诸子传》中王妃姓氏可考者，仅永安王高浚妃陆氏有可能是《魏书·官氏志》所说“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的鲜卑陆氏，华山王高凝妃王氏是汉人抑乌丸王氏或高丽王氏未能确定，此外彭城王高浹妃郑氏、上党王高涣妃李氏、任城王高潜妃卢氏、高阳王高湜妃张氏均是汉人。此张氏父宴之且有传见《北史》卷四三，谓“幼孤有至性，为母郑氏教诲，动依礼典”，应出于士族，李、卢、郑三氏加上汉人中的王氏更是山东地区“为大”的郡姓。凡此可知高欢本就多择汉人士族或已汉化的元氏皇室之女为其儿媳，而史传中也未说娄氏对此有何异议。至《文宣皇后李氏传》中所说反对立李氏为高洋皇后的高隆之、高德政，前面讲过又都是汉人。而高德政主张立为高洋后的段昭仪，据《北史》卷一四《后妃传》知是段韶之妹，段韶及父段荣传见《北齐书》卷一六，说段荣之妻亦即段韶兄妹之母乃娄氏皇后之姊。但段荣本身却是“姑臧武威人”，“祖信仕沮渠氏，后入魏，以豪族徙北边”，段韶“雅性温慎，有宰相之风，教训子弟，闺门雍肃，事后母以孝闻”，知仍与高隆之、高德政同为汉人而非鲜卑。高德政固请立段昭仪，显然是由于昭仪之母乃娄氏之姊，可借以见好于娄氏及段荣父子，如《文宣皇后李氏传》所说“欲以结勋贵之援”，并未关系到什么民族问题。《李氏传》说高隆之、高德政讲“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的话，怕也是史官的妄说而不见得是实录，因为让身为汉人的二高无耻到公开地讲这种歧视汉人的话，实在叫人有点难于听信。至于这李氏之得立为皇后且“独蒙礼敬”，自然也只是由于高洋之悦其“容德甚美”，和民族问题并无关系。杨



愔之支持高洋立此李后，也只是忠于其主或将顺其主，并不表示他站在汉人立场说话。当然更不能说娄氏因为儿媳是汉人，就会连孙儿高殷一起作为对立面来反对掉。

剩下一个问题，即前引《北史·杨愔传》在记述杨愔等被擒获后，还说：

[常山王高演等]送愔等于御前。……太皇太后(娄氏)临昭阳殿，太后及帝侧立，常山王以砖叩头，进而言曰：“……杨遵彦(愔字遵彦)等欲擅朝政，……若不早图，必为宗社之害。臣与湛等为国事重，……共执遵彦等，领入宫，未敢刑戮，专辄之失，罪合万死。”帝(高殷)时默然，领军刘桃枝之徒陛卫，叩刀仰视，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厉声曰：“奴辈即今头落！”乃却。因问杨郎何在，贺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怆然曰：“杨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让帝曰：“此等怀逆，欲杀我二儿，次及我耳，何纵之！”帝犹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嫗斟酌。”太后拜谢。常山王叩头不止，太皇太后谓帝：“何不安慰尔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但愿乞儿性命，儿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处分。”遂皆斩之。

这里有好些情节值得怀疑。(1)杨愔等既已被执，即可处置，何以要执送到内朝昭阳殿上，难道不怕高殷、李太后为之解救。(2)其时太皇太后娄氏也在殿上，杨愔被毆“一目已出”的惨状自可目睹，何以还要问“杨郎何在”？“一目已出”当尚可抢救，何况娄氏还说了“杨郎何能为，留使不好邪”的话，何以卒不能救而“遂皆斩之”？(3)当时殿上已有禁卫且愿为高殷效力，即就所说“领军刘桃枝之徒卫陛，叩刀倾视”也可证实，但经娄氏喝声“奴辈即今头落”就会“却仗”退走，难道娄氏在当时真有如此威力？(4)娄氏面斥李氏为“汉老嫗”而李氏还得拜谢，高殷也会说出“但愿乞儿性命，儿自下